# 自由與財產

作者：Ludwig von Mises ｜譯者：吳莉瑋





原文來源：Mises Institute ｜中文發行：LW Studio ｜封面照片：VinothChandar

這篇文章最初為演講稿，於 1958 年 10 月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朝聖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第九次會議中發表。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518 West Magnolia Avenue
Auburn, Alabama 36832

www.mises.org

ISBN: 978-1-933550-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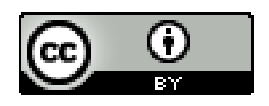


LW Studio
Taipei, Taiwan

lwstudioorg.blogspot.com

封面照片：

VinothChandar
www.flickr.com/photos/vinothchandar/4351008070/



# 目錄

# 第一部分

18世紀末盛行兩種自由的概念，這兩種都相當不同於我們現今所認知的自由（liberty 與 freedom）。

這兩個概念中的前者為純粹學術概念，並未涉及任何政治事務的應用。這個想法源於一些研究當時高等教育總和與實質內容的古籍。在希臘與羅馬作家的眼中，並不是所有人都被賦與自由（freedom）。自由是少數人的特權，大眾不擁有自由。希臘人所謂的民主，在現今的術語中，並非像林肯所稱的民治政府，而是寡頭統治，一種由擁有全數權利之社群公民與非希臘人（m é t è que）或奴隸所組成之大眾所構成的主權。即使是這種有限的自由，直到公元 4 世紀都未有哲學家、歷史學家或雄辯家將自由視為實用的憲法組成。在他們眼中看來，這是無法挽回的過去。他們哀嘆黃金時代的逝去，而不知道平反自由的任何方法。

第二個自由（liberty）的概念則不遜色於寡頭，儘管它的起源沒有任何文學追憶。自由是士紳貴族反對王權專制上漲以維護其特權的野心，有時也包含居於城市的統治階層。在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王族通常在這些衝突中最後勝利。士紳和城市統治階層只在英國和荷蘭成功擊敗王朝。但他們贏得的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是精英的自由，少數人的自由。

對於那個年代的人，擁戴自由的同時保留很多法律障礙甚至是農奴與奴隸制，我們不能譴責他們是偽君子。他們面臨著不知該如何圓滿解決的問題。傳統的生產體系對於不斷上升的人口而言過於狹窄。就某層面而言，

資本主義方法之前的農業與手工業，沒有增加的空間可以留給當時的人口。這些超數人口都是飢餓的貧民。他們是現有社會秩序的威脅，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人能想到另一種可以養活所有可憐蟲的秩序或狀態。不會有所謂是否給予他們充分公民權的問題，更不用說讓他們參與國務，統治者唯一的權宜之計，就是訴諸武力讓他們保持安靜。

# 第二部分

資本主義制度之前的生產系統具有限制。其歷史基礎是軍事征服。戰勝的國王將土地分封給騎士。這些貴族因此成為領主，因為他們不依賴於市場上消費者的購買或不購買。另一方面，他們本身是加工產業的主要消費者，也就是以合作計畫組織的行會制度。此計劃反對創新，禁止偏離傳統的生產方法。人們可謀生的職位數目有限，甚至是農業或工藝領域。在這些條件下，套用馬爾薩斯的話，很多人發現「世界容不下自己」所以「自己得消失」。[1] 但部分的棄兒設法生存了下來、生了孩子，使得貧困者的數量越來越多。

但資本主義出現了。一般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的激進創新帶來機械工廠，取代較原始與低效的工匠鋪。這是一個相當粗淺的看法。資本主義的特徵中，用來與資本主義之前的生產方式相區隔的是資本主義的新式營銷原則。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大規模生產，而是大規模生產以滿足群眾需求。老式的商品生產幾乎完全迎合富人希望。但工廠生產許多給大眾的便宜商品。所有的早期工廠最終目的都是為群眾服務，這些群眾也是在工廠工作的同一群人。這些工廠直接服務大眾，或者是透過出口換來外國食品與原料而間接服務大眾。這種像當今資本主義一樣的營銷原則是早期資本主義的標誌。僱員本身是大部分生產出來之商品的消費者。他們是握有主權、「永遠正確」的客戶。他們購買或不購買的行為，決定了什麼商品被生產、以什麼樣的品質生產多少數量。透過購買最能滿足自己的商品，他們讓一些企業獲利與擴

1　Thomas R. 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第 2 版，倫敦，1803 年，頁 531。

張，又讓其他企業虧損與縮減。由此，他們不斷地將生產要素的控制權轉移到那些最能滿足他們的商人手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要素的私有財產是一種社會功能。企業家、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消費者的僕人，而他們的僕役可能會被撤銷。為了富有，光儲存與積累資本還不夠，再次投資是弊要的，而且要投資到那些最能滿足消費者的生產線上。市場過程是每天不斷重複的全民公決，而且並不可避免地把那些不依公眾希望來處置財產的人踢出獲利排行。企業變成那些當代所有政府與自封的知識份子狂熱仇恨的目標，但企業只是因為服務大眾才變得勢力龐大。那些迎合少數人的奢侈品，從來沒有達到大規模的程度。19世紀史學家與政治家的缺點，就是他們沒有認識到工人是工業產品的主要消費者。在他們眼中看來，「打工仔」只是為了寄生閒暇階層的利益而勞碌。他們受制於工廠削弱許多勞動者的錯覺，如果他們對任何統計數字稍加注意，很容易就會發現他們意見中的謬誤。嬰兒死亡率下降、平均壽命延長、人口加倍，而一般的普通人享有甚至是以前的富人都想像不到的設施。

然而，這種群眾前所未有的富裕僅是工業革命的副產品。工業革命的主要成是把經濟霸權從土地所有者轉移到所有人手上。普通人不再是因為富人桌上掉下來的麵包屑就要感到滿足的苦力。資本主義時代之前的三種賤民—奴隸、農奴，還有 16 到 19 世紀那些神父、學者跟英國法院所稱的窮人，都已消失。他們在這個企業時代中，不僅變成自由的工人，同時也是消費者。這種激進的變化反映了企業強調的市場。企業需要的，就是市場、市場、市場。它是資本企業家的信號。市場，意味著食客、採購商、消費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發財

路只有一條：比其他人更便宜、更能服務消費者。

商店與工廠所有者，或是企業總裁與股東代表，雖然稱為老闆。但這只是表面上的主控權，而且帶有條件，他們都受消費者控制。消費者為王，消費者才是真正的老大，如果生產商不以最好的服務超越競爭對手，就沒戲唱了。

世界正因這種巨大的經濟變革而改頭換面，迅速將政治權力從少數特權者手中轉移到人民手中。工業解放後隨之而來的是選舉權。那些透過市場過程而被賦予選擇企業家與資本家之權力的普通人，也在政府領域中開始掌控類似的權力，成為選民。

著名經濟學家也觀察出這種現象，我認為第一位是法蘭克．菲特（Frank A. Fetter）：市場就是民主，而每一分錢都是一分投票權。更正確地說，由人民代表組成的政府，是想將市場範本套用到政治事務的嘗試，但這種設計永遠無法完全實現。在政治領域中，始終存在少數意志必須屈服於多數意志的情況。這種制度也只服務於少數群體，只是數量不像以前那樣微不足道因而被忽略。服裝業不只替一般身材者生產，也替魁武身材生產衣服；出版業不僅出版大眾閱讀的西部故事和偵探小說，還出版特定讀者群的書。還有第二個重要區別。在政治領域中，個人或少數族群沒有辦法不遵守多數人的意願。但在私有財產理論下這種反叛成為可能。反叛者需要替自己的獨立性付出一定的代價；在這個宇宙中沒有不透過犧牲就能換得的獎盃。但如果有人願意支付代價，他就能自由地偏離主流。

而在齊克果、叔本華、韋伯倫或弗洛伊德所謂的社

會主義大家庭中，異端的情況又會如何？莫奈、庫爾貝、華特．惠特曼、里爾克、卡夫卡，會變怎樣？在所有時代中，思想與行為先鋒，都是因為私有財產讓蔑視主流成為可能。這些獨立派中只有少數人的自身經濟狀況足以藐視政府與主流意見。但他們可以在自由經濟中找到公眾之中願意幫助並支持他們的人。如果馬克斯沒有他的靠山製造商恩格斯的話會如何？

# 第三部分

社會主義者未能瞭解市場經濟中的消費者主權，這讓他們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批判完全不成立。他們只看到各種企業與計畫中的分層組織，而未能理解利潤制度迫使企業服務消費者。在與僱主的交涉中，工會認為阻礙他們獲得更高薪資的是惡意與貪婪。他們的短視讓他們看不到任何工廠大門以外的事情。他們和他們的追隨者談論著經濟權力集中，卻沒有意識到經濟實力最終歸屬於由僱員組成的龐大消費公眾。他們沒能看清那些被他們錯誤譬喻為工業王國或公爵的情況，他們過於笨拙，看不出主權國王或公爵以及「巧克力大王」兩者間的差異，主權國王或公爵只會被更強大征服者剝奪權力，但「巧克力大王」可能會因為顧客喜歡光顧另外一家供應商就失去自己的「王國」。這種扭曲是所有社會主義計劃的基礎。如果有任何的社會主義領袖曾經試過靠賣熱狗營生，他就會學到消費者主權。但他們是職業革命家，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點燃內戰。列寧的理想是把郵局系統當成模範來建立國家的所有生產，不依賴於消費者模式，而以強制徵收的稅款支付赤字。他說：「整個社會變成一間辦公室與一間工廠。」[2] 他沒有預視到，當辦公室和工廠成為唯一，人民也沒有機會去選擇不同企業的商品與服務時，其本質將完全改變。因為他的盲目性，他不可能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市場與消費者發揮的作用，他看不到自由和奴役之間的差異。在他的眼裡，工人就只是工人，而不同時是消費者，他相信他們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奴隸，但這種狀態並不會因為國有化所有工廠與商店就有所改變。社會主義用單一獨裁者的主

2　V.I. Lenin，《State and Revolution》，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頁 84。

權，或者是獨裁委員會的主權，取代消費者的主權。而公眾的政治主權也將隨著經濟主權的消失而消失。廢止消費者參與過程的生產計劃，在政治領域中，就是剝奪公民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的政黨原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罐頭食品與肥皂品牌的選擇權被剝奪的人，同時也被剝奪政黨、政策與公職人員的選擇權。他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至高無上社會工程師手中的一個棋子。就連扶養後代的權利也會因為優生學而被剝奪。當然，社會主義領導人偶爾會向我們保證，獨裁暴政只是過渡時期，從資本主義的代議制轉變到滿足所有人需要與願望的黃金社會主義。[3] 只要社會主義政權「安全到足以承受批評的風險」，英國新劍橋學派的傑出代表瓊．羅賓遜女士（Joan Robinson）還承諾，「甚至獨立的愛樂社團」都被允許存在。[4] 因此，清算所有異議者是帶來共產主義者所謂自由的條件。從這個角度看來，我們也可以了解，當另一個傑出英國人科洛特先生（J.G. Crowther）在稱讚「文字獄保護崛起階級因而有益」時，腦子裡在想什麼。[5] 這一切的意義都很明顯。當所有人都溫順地向獨裁者低頭時，就不再有需要清算的異議者。卡利古拉、托爾克馬達和羅伯斯比爾可能會同意這種解決方案。

社會主義者進行了一場語義革命，將術語的意義扭轉成原先意義的相反。在喬治．歐威爾稱為「新話」的詞彙中，有個「一黨原則」。其中，「黨（party）」語源衍生於「組成（part）」這個名詞，而「一」則不

3　Karl Marx，《Sur Kritik des Sozialdemoskratischen Programms von Gotha》，Kreibich，Reichenberg，1920 年，頁 23。

4　Joan Robinson，《Private Enterprise and Public Control》，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 Ltd. 替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Citzenship 出版，頁 13－14。

5　J.G. Crowther，《Social Relations of Science》，倫敦，1941 年，頁 333。

再與「全」這個反義詞相反，而是相同。一黨不是單一個黨，一黨原則實際上是無黨原則，被用來壓制任何反對。自由本來的意思是贊成與異議的權利，但在新話中，自由意味著無條件同意以及嚴格禁止異議。這種傳統政治術語意義的逆轉，不只是俄羅斯共產黨的語言，及弟子法西斯與納粹也是如此。那種廢除私有財產、剝奪消費者自主與獨立，從而使得每個人都服從於專斷中央計劃委員會的社會秩序，如果沒有透過這種偽裝，無法贏得群眾擁護。如果社會主義者曾經公開告訴選民最終目標是把他們變成奴僕的話，就不算欺騙選民。為了普及，社會主義者被迫要從事歌頌傳統自由價值的應酬話術。

# 第四部分

在這個龐大陰謀的小圈圈內，對自由的深度討論則不太相同。策劃者並未掩飾他們對自由的意圖，自由在他們眼裡是過去布爾喬亞社會框架下的有益特徵，因為它提供計劃開始的機會。但是，一旦社會主義勝利後，不再需要任何自由的思想與個人的自主行動。任何進一步變化都會偏離人類的完美狀態—社會主義的幸福。在這種情況下，容忍異議是一種精神錯亂。

布爾什維克說，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偏見。普通人沒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普通人不寫書，普通人不散播邪說，普通人不創造新的生產方法。普通人只想享受生活。普通人和那些將異議與創新當成謀生職業之知識份子的階級利益不同。

當然，認為普通人不創造是最傲慢的藐視。但沒有必要爭論普通人是否從自由思考、談話、寫書中獲益這點。爭點在於那些普通人是否可以從智力、意志力都相對優越者所獲得的自由中獲益。普通人可以不關心甚至可以藐視這些優越者所做的事，但仍欣然享受優越者投入創新之努力所帶來的好處。普通人不理解看來不過是空洞又吹毛求疵的思想或理論，但只要這些思想和理論被積極的商人採用以滿足普通人的潛在慾望，普通人又會急著去購買新產品。普通人無疑是現代科學與技術成就的主要受益者。

確實，天分一般的人很難有機會晉升行業領袖。但市場所賦予的消費者經濟主權，可以激勵技術人員與推動者去應用科學研究成果。只有那些見地不超出工廠內

部組織，也不知道是什麼在激勵商人的人，才不會注意到這個事實。

蘇聯體制的崇拜者們不斷告訴我們自由不是至善。如果自由意味著貧困，就「不值得擁有」。為了創造群眾財富而犧牲自由，在他們眼裡完全合理。除了少數的不羈個人主義者無法服從一般群眾的生活方式外，所有的俄羅斯人都非常快樂。至於那數百萬名死於飢餓的烏克蘭農民、勞改犯人、被清算的馬克思主義領導人，是否也都對這種幸福有感，就讓問題保持未定吧。但我們不能忽略事實，西方自由國家的生活水平比起東方共產主義國家的生活水平高得多。將放棄自由當成步入繁榮的代價，俄羅斯打了個差勁的算盤，他們現在既沒有自由也沒有繁榮。

# 第五部分

浪漫主義哲學幻想人類在歷史早期全然自由，而歷史演變的過程中剝奪了人類的原始自由。在盧梭眼裡，自然賦予人自由而社會則奴役人。事實上，原始人處於弱肉強食的處境，每一個比自己強壯的人都可能搶走自己稀有的生活資源。自然沒有給出什麼自由。自由的概念只在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誠然，社會無法實現個體絕對獨立的虛幻概念。在社會中，每個人都依賴其他人，人們彼此貢獻以換取幸福，社會本質上是相互交換服務。只要個體有選擇機會，就是自由的；如果個體受到暴力或者是暴力威脅，因而被迫同意交換條件，不管當事者觀感如何，都不是自由。奴隸不自由，因為主人分配任務給他並決定如果任務完成他可以得到什麼。

至於政府這個鎮壓和強制的社會機構，不會有什麼自由的疑問，政府本質上是對自由的否定。政府訴諸暴力或以暴力威脅，使所有人民服從政府命令，不管人民喜不喜歡。只要在政府管轄範圍內，就有強迫，而非自由。政府是一種社會制度，讓合作順利進行而免於國內或國外暴力行為干擾的手段。政府不是像有些人說的「必要之惡」，政府不是邪惡，而是一種手段，使人類和平共存成為可能的唯一手段。但是政府與自由對立，政府代表了毆打、監禁、絞刑。無論政府做什麼，最終都受武裝警察支持。如果政府經營學校或醫院，所需資金由稅收提供，即，公民身上取得的付款。

如果沒有政府機構防止暴力，人的本性既不文明也不會帶來和平，考慮到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稱政府為人類最有益的機構。但事實上，政府仍是壓制自由。自

由只存在於政府不干預的領域。自由（liberty）永遠是從政府手中獲得的自由（freedom），是限制政府干預。自由只存在於公民有機會照自己意願選擇的領域中。公民權是一種限制性法規，精確地劃出公職人員可以限制個體自由的範圍。

建立政府的最終目標是讓基於勞動分工原則下的社會運作系統成為可能。如果人們想擁有的社會制度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規劃），那就沒有自由的空間。所有公民在每個方面都遵照政府命令。國家是整體；政權是極權主義。單靠政府計劃並迫使公民服從這個單一計劃。在市場經濟中，個人可以自由選擇融入社會合作框架的方式。只要有市場交換，就有個人的自發行為。這個制度被稱為自由放任，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稱為夜警國家（the night-watchman state），自由是因為存在個人可以自由地替自己規劃的領域。

社會主義者必須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會有任何自由。但他們忽略奴性國家與經濟自由間的差異，否定商品與服務交換市場中存在自由。親社會主義學派說，每一個市場交換都是「對他人自由的脅迫」，而在他們眼中，支付稅項與法官強制罰款和買報紙或看電影一樣，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差別。在這些案例中，人都服從於統治權，人不自由。黑爾教授說，自由是指「無障礙地使用任何物資」。[6] 這意味著：因為有個女人為了張羅丈夫的生日禮物而織了件毛衣，使得我要用那件毛衣會有障礙，所以我不自由。我本身也限制了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因為我反對別人用我的牙刷。根據這個學說，我這樣做是在行使私人統治權，類似於政府把人關到新新

6　Robert L. Hale，《Freedom Through Law, Public Control ofPrivate Governing Powe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1952 年，頁 4 以後。

監獄（Sing Sing）的公權力。

這個驚人的學說合乎邏輯地推導出自由無處可尋的結論。他們斷言所謂經濟壓力本質上無異於主人對奴隸施加的壓力。他們拒絕所謂私人統治權，但他們不反對公權力限制自由。他們希望將所謂自由的限制集中到政府手中。他們攻擊私有財產制與法律，正如他們所言：「執行財產權就是否定他人侵犯財產權的自由。」[7]

所有上一代的家庭主婦都會遵循母親傳授的食譜來準備菜餚，但現在許多家庭主婦更樂於購買加熱後就可以端上桌的罐頭。但我們剛剛學到的教授們說，罐頭限制了家庭主婦的自由，因為罐頭公司對罐頭收取費用，這妨礙了家庭主婦使用罐頭。那些享受不到這些傑出教師指導之特權的一般人會說，罐頭公司提供罐頭產品，消除了消費者取得並使用罐頭的最大障礙，也就是「不存在罐頭」。如果產品不存在，就不能滿足任何人。但這些教授說他們錯了，罐頭公司統治家庭主婦，有過多權力集中在罐頭公司，破壞了家庭主婦的個人自由，而政府有責任防止此類嚴重侵犯。此學說另一分派的貝利教授接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他說，企業必須受到政府管控。[8]

為什麼家庭主婦要買罐頭食品而不是遵循母親或祖母的方法？毫無疑問，因為她認為這種方式比傳統方式更方便。沒有人逼她。一些人透過投資罐頭工廠而滿足了數百萬計家庭主婦的潛在需求，這些人被稱為批發商、

7　同上，頁 5。

8　A.A. Berle, Jr.，《Economic Power and the Free Society,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the Corporation》，New York: The Fund for the Republic, 1954 年。

推動者、資本家、投機者、交易所賭徒。在其它為數眾多的企業中，也有著同樣自私的資本家為消費者提供許多其他各式各樣的商品。企業的服務做得越好，就會得到越多客戶，規模就會越大。隨便走進一間美國普通家庭，你就會理解機器的齒輪為誰而轉。

在自由國家裡，沒有人被禁止透過提供更好服務給消費者而致富。需要的只有頭腦和努力工作。著名英國經濟學家名單中的最後一位，埃德溫．坎南說：「現代文明，幾乎所有文明，基礎都是獎勵那些取悅市場者並懲罰那些未能取悅市場者。」[9] 所有經濟集權的討論都無用，公司越大就替越多人服務，就會越依賴於取悅消費者，也就是群眾。在市場經濟中，經濟力量握在消費者手中。

資本主義企業不會滿足於當前生產狀態，而是不斷創新、反復嘗試，透過提供創新、改良、更便宜的產品來增進消費者所獲得的供給。任何生產活動的實際狀態都只是暫時的，整體的趨勢，是不斷用更好的方式取代現有方式以服務消費者。因而，資本主義制度會出現精英的連續循環。被稱為產業領袖的人擁有貢獻新想法並付諸實行的能力。不管公司規模有多大，若是疏於調整、未能以最佳方式服務消費者，就注定失敗。但政治家和其他準改革者只看到當前的產業結構。他們認為自己夠聰明，可以在奪走企業對工廠的控制權後，把工廠經營得像現在一樣好。當那些即將成為明日巨頭的野心新手準備進行前所未聞的計劃時，官僚心裡想的只是照著以往軌道進行例常事務。沒有任何紀錄表明，官僚曾經將工業創新付諸實現。如果人類不想陷入停滯，就得讓那

9　Edwin Cannan，《An Economist’s Protest》，倫敦，1928 年，頁 VI 以後。

些今日默默無名，但能到引領人類走上幸福道路的人，放開手腳地發揮天分。這是國家經濟組織的主要問題。

生產要素的私有財產制，並不是在限制其它人選擇的自由。相反的，它賦予消費者支配經濟事務的手段。它是刺激國家裡最有事業心的人發揮最大能力去服務他人的手段。

# 第六部分

然而，如果只談論消費者的市場主權、選民的政治主權，或是生活水平的空前改善，仍未完全道盡資本主義替普通人所帶來的巨大變革。資本主義讓人們可以儲蓄、積累資本與投資，這同樣重要。資本主義之前階級社會中分隔地主與貧民的那道鴻溝已被收窄。以前，領取微薄薪資的熟練工人幾乎沒法儲蓄，就算有，也只是囤藏幾個硬幣而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的能力讓儲蓄成為可能，而且存在讓他投資自己的資金的機構。在美國，工人儲蓄占了產業資本中相當的一部分，工人與受薪者透過存款、保險、債券還有股票，賺取利息及股息，因此，若以馬克斯主義術語而言，他們是剝削者。普通人不僅以消費者與員工的身分受益於企業發展，同時也是投資者。資本主義制度的普遍趨勢，是在一定程度上消去那些擁有生產要素者與不擁有生產要素者之間曾經存在的鴻溝。但當然，這種趨勢只會在不受所謂社會政策破壞的市場經濟中開展。福利國家透過廉價貨幣、信貸擴張以及不加掩飾的通貨膨脹，不斷地吸走每單位法定貨幣的購買力。而那些自我感覺良好的普通人，還相信那些有利於債務人卻犧牲債權人的政策，對普羅大眾非常有益。他們未能理解市場經濟的本質，這也體現在他們未能看清這個明顯的事實：那些人他們以為自己所援助的對象，正是那些身為債權人的儲戶、保戶與債券持有人。

# 第七部分

西方社會哲學的獨特原則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旨在創造一個讓個體能夠自由思考、選擇與行為的環境，免於強制性與壓迫性國家機構干擾的限制。所有西方文明的精神與物質成就，都是這種自由概念的運作結果。

這種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原則與政策，及其於經濟事務中的應用，不需要任何辯護士或宣傳員。成就會自己說話。

先不考慮別的，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產制在生產力上擁有無以倫比的高效率。正是這種效率讓資本主義企業足以支撐快速增長的人口以及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這種群眾逐步繁榮的結果，創造出一個可以讓才華出眾者能自由發揮的社會環境。私有財產與有限政府的社會制度，是唯一能讓這些人完全開發天賦的系統。

貶低資本主義取得的物質成就是一種無厘頭的娛樂，說有比更大更快的機動車和配備中央空調、冰箱、洗衣機、電視等住房等等還要更重要的東西。當然，是有一些更遠大更崇高的追求，但它們之所以崇高，是它們無法透過外部努力，只能透過個體的決心與努力來達成。用這種方式來指責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其觀點甚至更粗淺也更物質主義，因為他們假設道德與精神文化只能透過政府或組織化的生產活動而建立。這些外部因素都只是在提供讓個人有機會實現自我完善與薰陶的環境。大眾喜歡拳擊賽甚於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喜歡爵士樂甚於貝多芬的交響樂，喜歡漫畫甚於詩歌，這不是資本主義的錯。雖然現今世界很大一部分仍處於資本主

義之前的狀態，因此只有一小群人能取得這些好東西，但可以肯定的是，資本主義給了群眾追求這些好東西的好機會。

不管從什麼角度看資本主義，都沒有理由去感嘆所謂美好時光的逝去，更沒有理由去合理化極權主義烏托邦，不管是納粹或是蘇聯的類型。

今晚將舉行《朝聖山學會》第九次會議的開幕式，在這種場合下，別忘了我們正在對同時代的主流觀點與多數國家政策表達異議，而這只在自由的社會風氣才有可能，這是西方文化中最珍貴的標記。讓我們祈禱，這種異議權永遠不會消失。

…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經濟事務中的應用，不需要任何辯護士或宣傳員。成就會自己說話。

— Ludwig von Mises